

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变动及成因*

——以 2010 年 7 省（区）调查为基础

王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以 2010 年“中国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动分析”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 1979～2010 年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变动状况及成因。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逐渐扩大，跨省婚姻明显增加；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明显大于男性，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扩大的可能性明显高于男性；省内、跨省务工和受教育程度是导致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扩大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改变了农村人口婚姻行为的场域、惯习和资本。

关键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 性别 外出务工 高等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制度变革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改善了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居民婚姻择偶观念随之变动。经济发展带来了各项技术的进步，交通和通讯条件日益便捷，人们社会交往的时空条件限制大幅减少，社会交往的范围显著扩大，为婚姻行为的变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2010 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了 2.6 亿，占中国人口总数（未包括港澳台人口）的 19.4%^①。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完成了控制人口总量过快增长的目标，但使得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长时期存在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已经与当前婚配性别结构失衡以及男性婚姻挤压问题交织在一起。

在城乡人口流动的大潮中，婚姻流动成为人们改变社会地位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孔雀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状态、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贫困地区通婚圈变动与男性婚配困难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CRK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国家统计局：《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http://www.stats.gov.cn>。

东南飞”是改革开放后婚姻流动的形象刻画。在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和男婚女嫁、“男高女低”的婚姻择偶制度等约束条件下，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很难从较发达地区农村及城市吸引到配偶，农村女性向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村及城市的婚姻流动则相对容易。女性婚姻流动提高了东部发达地区婚姻市场上的新娘供给，缓解了东部地区人口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却与之相反，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问题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也加剧了买卖婚、骗婚和畸形婚姻等社会问题，威胁到当地婚姻家庭稳定、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发展。向东部发达地区婚姻迁移的农村女性也面临着婚后家庭关系融洽和社会关系融合等问题。一般来说，婚姻迁入东部地区的中西部地区女性大部分嫁给了当地的底层男性，她们作为家庭和地区的“双重外来者”，需要面对和处理比当地女性更为复杂的问题（谭琳等，2003）。

当前农村适婚人口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婚恋年龄阶段，他们更多地远离村落进城务工，更可能与在务工地所接触到的异性交往、恋爱和结婚。那么，在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的时代大环境下，当前农村适婚人口的姻缘在何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发生着怎样的变动？是传统的“青梅竹马”，还是现代的“有缘千里来（城市）相会，无缘对面（乡村）手难牵”？

二、文献回顾

婚姻圈也称通婚圈，它包含地理和社会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中，地理层次的通婚圈为地理通婚圈。人类学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并强调文化制度对通婚圈的决定作用（例如刘传江，1991）。社会学使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并关注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对通婚圈的影响（例如陆益龙，2001；黄润柏，2010）。民族学则分析民族通婚圈以考察民族融合程度（例如黄兴球，2003）。经济学色彩浓厚的婚姻市场概念被用来研究婚姻行为或婚姻对象的潜在范围（例如郭志刚、邓国胜，1995）。人口学则主要通过分析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流动和婚姻迁移来研究通婚圈（例如黄佩芳，2004；周皓、李丁，2009）。有关通婚圈的研究并不是学科分隔的，诸多文献是多学科多视角交叉研究的成果。比如，对村落范围民族通婚圈的研究呈现了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复合色彩；更多地使用婚姻市场概念来研究婚姻行为的不是经济学者而是人口学者。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和农村婚姻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女性外嫁的重要条件，外出打工扩大了农村打工女的地理通婚圈（邓国彬、刘薇，2001；仰和芝，2006），另一方面，外出打工导致欠发达地区农村男性陷入婚姻困难的境地（贾兆伟，2008），带来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婚姻“弱势积累”问题（石人炳，2006）。

关于社会变迁进程中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变动趋势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结论：缩小、不变和扩大。“缩小”观点认为，由于婚媒形式的改变、劳动力需求和父母养老等实际需求，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缩小或内卷（邱泽奇、丁浩，1991；王跃生，2006）。“扩大”观点认为，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逐渐由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突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农村居民与县外乃至省外民间的通婚逐年递增（崔燕珍，2007）。只有“基本不变”的观点是以较大范围内的随机抽样调查为基础分析得出的（例如雷洁琼，1994）。人口学则充分利用数据优势从宏观层面研究地理通婚圈状态及其变动趋势。比如，有学者使用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各省份地理通婚圈的变动状况，并得出“多数地区异地婚姻比例近几年都在增加，婚姻圈在扩大”的结论（周皓、李丁，2009）。

一般来说，地理通婚圈的变动直接影响人们婚后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居住模式和代际关系。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将出生性别失衡的后果与压力转嫁到了西南地区，以西南地区底层男性的婚姻挤压加剧为代价缓解了东部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Cupta et al, 2010）。总体而言，已有关于地理通婚圈的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①偏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研究，强调人口结构因素和经济因

素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突出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决定的女性婚姻迁移优势对于农村地理通婚圈的影响；②定性研究多而定量分析相对较少，只有少量研究使用普查数据；③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变动的性别对比研究不多，分析基本以女性为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变动分析”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0年10~12月。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所选省（区）包括吉林、河北、陕西、安徽、浙江、广东和广西。该调查在7个省（区）分别调查3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县和3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区（县级），在每个县（区）抽取5个村庄（居民小区），在每个村庄（居民小区）抽取21户。此次调查最终获得问卷4425份，本文使用该调查数据中的“调查对象子女的人口、社会关系与婚姻”等数据，将婚姻状态限定为初婚，户籍限定为农业户口，获得有效调查对象共计2251个，96%的调查对象子女的年龄低于50岁。

表1 调查对象子女的性别和年龄构成（%）

年龄组	男性	女性	合计	年龄组	男性	女性	合计
20~24岁	7.25	11.92	9.60	45~49岁	6.80	9.44	8.13
25~29岁	22.09	22.07	22.08	50岁以上	3.76	3.00	3.37
30~34岁	22.18	21.27	21.72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35~39岁	21.82	18.71	20.26	观测数	1118	1133	2251
40~44岁	16.10	13.59	14.84				

（二）分析思路

本文考察以下三个问题：①当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呈现什么样的特征；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变化趋势如何，存在哪些性别差异；③影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变动的因素有哪些。根据社会学中的实践、场域和惯习理论，社会变迁导致婚姻实践的场域发生变化，持续的场域变化打破了传统婚姻行为习惯并形成新的惯习。这里，实践指的是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即农村人口配偶来源的地理范围；场域指的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本文使用初婚年代来代表；惯习指的是婚姻的风俗习惯，包括初婚年龄、婚姻对象结识途径和婚姻介绍人资源等，本文用受教育程度和务工地点来代表引起农村人口婚姻惯习变化的因素。

（三）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思路，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1：女性婚姻流动具有制度性优势，她们扩大地理通婚圈的可能性要高于男性。在农村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村男性更多地受到户籍、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扩大地理通婚圈的可能性比农村女性低。

假说2：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呈正相关关系，有外出务工经历、去更远地区务工的农村青年，其地理通婚圈更大的可能性更高。目前，农村青年离乡进城打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坚守在农村全职务农的情况已经比较少见，他们的择偶婚恋行为大部分发生在城市。城市中的青年农民工群体来自全国各地，客观上提高了他们扩展地理通婚圈的可能性。

假说3：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呈正相关关系，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农村青年，其地

理通婚圈更大的可能性更高。中国高等院校绝大部分位于城市，尤其是集中在大中城市，在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校园中，农村生源大学生与更远地区异性婚恋的可能性提高。大学毕业后，部分农村生源大学生留在城市工作、择偶和结婚，他们扩大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可能性在提高。

（四）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Stata11.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处理，首先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然后使用 ordinary probit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变动的因素，具体模型如下：

$$P_r(Y = y_i | x_1, x_2, x_3, \dots, x_k) = F(b_0 + b_1x_1 + b_2x_2 + b_3x_3 + \dots + b_kx_k) \quad (1)$$

（1）式中， Y 是序次变量， Φ 是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x_1 、 x_2 、 $x_3 \dots x_k$ 为自变量。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现状与变动

1.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概况。地理通婚圈分为本村、本乡、本县、本市、本省和外省 6 个圈层^①，每一圈层既不包含更靠内的所有圈层，又不包括更靠外的所有圈层，比如，“本乡”代表“不包括本村的本乡其他村”，“本县”代表“不包括本乡的本县其他乡”。目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为本村的比例（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为本圈层的样本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以下皆同）接近 20%，未超出本乡的比例达到 40%，未超出本县的比例略多于 70%，未超出本市的比例多于 80%，未超出本省的比例多于 90%，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为外省的比例不到 10%。分性别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与总体状况基本一致，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为本村和本乡的比例均高于农村女性，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为本县、本市、本省和外省的比例均高于农村男性。如果将居住地视为圆心，那么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更加内敛，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则更加发散。

分地区看，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具有以下两点特征：①从村内婚的比例看，中部地区最高而西部地区最低，且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一致；②从跨省婚的比例看，同样是中部地区比例最高，东部和西部地区比例比较接近，其中，男性跨省婚的比例呈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的格局，女性跨省婚的比例呈现“中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最低”的格局。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要远于东部地区农村女性，东部、中部地区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要远于西部地区农村男性，中部地区农村男性和女性地理通婚圈均为最远。

随着年龄的下降，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为本村的比例逐渐减少，而为本省的比例则明显逐渐增加，为外省的比例也呈略微增加的态势；随着年龄的下降，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为本村的比例呈略微减小的趋势，为本省或外省的比例均呈明显增加的趋势。

将初婚年代分为 1979~1989 年、1990~1999 年、2000~2005 年和 2006~2010 年 4 组，结果表明，随着初婚年代的推移，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表现出明显扩张的趋势：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为本村和本乡的比例在减小，而为本省和外省的比例都在显著增大。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为本省的比例由 1979~1989 年的 2.86% 增至 2005~2006 年的 8.5%，为外省的比例则由 6.21% 增至 14.08%；女性相应分别为 2.86%、10.68% 和 4.00%、10.98%。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扩大主要是由本省和跨省婚姻增加所致。

^①为简化起见，“本村”代表“本村和本社区”，“本乡”代表“本乡镇”，“本县”代表“县级层次的县、市和区”，“本市”代表“地级层次的市、地区和自治州等”，“本省”代表“省级层次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分务工地点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将务工地点分为本乡、本县、本市、本省和外省 5 组,分析发现:随着外出务工地点的向外扩展,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为本乡的比例逐渐减小,而为本省、外省的比例大致逐渐增大。随着外出务工地点的向外扩展,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为本省、外省的比例呈现更明显的增加趋势(见表 2)。简而言之,务工地点越广,则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越大,而且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随着务工地点扩展而扩大的趋势更明显。

表 2 分务工地点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 (%)

性别	务工地点	配偶来自						合计
		本村	本乡	本县	本市	本省	外省	
男性	本乡	25.44	24.78	28.45	10.13	5.60	5.60	100.00
	本县	25.80	19.76	37.90	6.05	4.44	6.05	100.00
	本市	8.41	15.79	21.05	42.11	6.32	6.32	100.00
	本省	9.09	14.14	30.30	6.07	21.21	19.19	100.00
	外省	17.76	29.95	26.90	5.08	4.57	15.74	100.00
女性	本乡	20.97	22.40	31.18	14.16	5.20	6.09	100.00
	本县	18.88	24.46	41.63	7.30	5.15	2.58	100.00
	本市	12.90	9.68	16.13	44.09	7.52	9.68	100.00
	本省	5.43	11.96	32.61	18.48	20.65	10.87	100.00
	外省	13.38	17.61	23.94	3.52	11.27	30.28	100.00

3.分受教育程度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随着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为本村、本乡的比例逐渐降低,为本市、本省和外省的比例逐渐提高。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村人口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状况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为本村的比例减小的趋势更明显,为外省的比例增大的趋势更明显(见表 3)。简而言之,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地理通婚圈越大,而且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扩大的趋势更明显。

表 3 分受教育程度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 (%)

性别	受教育程度	配偶来自						合计
		本村	本乡	本县	本市	本省	外省	
男	未上过学	30.00	30.00	10.00	10.00	20.00	0.00	100.00
	小学	25.68	18.02	32.88	10.80	5.86	6.76	100.00
	初中	22.12	25.50	27.96	9.52	6.30	8.60	100.00
	高中或中专	15.62	21.88	37.50	10.00	6.88	8.12	100.00
	大专	12.24	18.37	26.53	20.41	10.21	12.24	100.00
	大学本科及以上	3.85	15.38	19.23	30.77	3.85	26.92	100.00
女	未上过学	18.60	20.93	44.19	9.30	4.65	2.33	100.00

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变动及成因

性	小学	15.29	25.16	37.90	8.91	7.96	4.78	100.00
	初中	20.67	20.00	27.07	15.46	5.88	10.92	100.00
	高中或中专	11.50	15.04	36.28	17.70	8.85	10.63	100.00
	大专	5.41	8.11	35.14	29.73	13.51	8.10	100.00
	大学本科及以上	10.00	10.00	20.00	2.00	23.33	16.67	100.00

(二) 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回归分析

此部分主要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配偶来自”)是定序变量,本文使用 ordinary probit 模型估计性别、务工地点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影响。由于本文意在发现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而初婚年龄和初婚年代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 0.93),故保留初婚年代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配偶来自	本村=1, 本乡=2, 本县=3, 本市=4, 本省=5, 外省=6	2.93	1.48	1	6
自变量					
性别	男性=0, 女性=1	0.50	0.50	0	1
务工地点	未外出=0, 本县=1, 本市=2, 本省=3, 外省=4	1.25	1.48	0	4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0, 小学=1, 初中=2, 高中或中专=3, 大专=4, 本科及以上=5	1.98	0.91	0	5
初婚年代	1979~1989 年=0, 1990~1999 年=1, 2000~2005 年=2, 2006~2010 年=3	1.70	1.05	0	3
控制变量					
地区	吉林=0, 陕西=1, 河北=2, 安徽=3, 浙江=4, 广东=5, 广西=6	3.17	2.00	0	6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与男性相比,农村女性扩大地理通婚圈的可能性更高;2006~2010 年初婚年代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 2006 年以后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扩大尤为明显;本市务工、本省务工和外省务工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影响为正,说明具有远距离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更远的可能性更大;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影响为正,说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的地理通婚圈更远的可能性更大。2006 年之后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扩大的趋势最为明显,这一事实可能与两个因素有更多的关系。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逐渐成为婚姻市场上的主力,决定了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显著扩大的趋势。二是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之后毕业工作的农村生源大学生逐渐迈入婚姻。归结起来,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扩大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人口的流动、求学、务工、工作和婚姻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上文中分年龄和分初婚年代的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状况表明,农村男性和女性的地理通婚圈都在扩大。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扩大的可能性更明显,婚姻制度、户籍制度所决定的女性婚姻迁移优势是其决定因素,农村女性婚姻迁移受到户籍等社会制度的限制更小,因而她们更容易外嫁到更远的地区。模型估计结果基本验证了三点研究假说:农村女性扩大地理通婚圈的可能性要明显高于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尤其是远距离务工)增加了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扩大的可能性,受教育程度(尤其

是高等教育经历)是影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扩大可能性的重要因素。

尽管务工地点、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初婚年代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解释依然有限,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它受到婚姻关系双方的个体、家庭、地区、经济、文化和观念等因素全方位和多层级的综合影响。

表 5 影响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的 ordinary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性别(参照组: 男性)		
女性	0.16 ^{***}	0.05
务工地点(参照组: 未外出)		
本县	-0.13 ^{**}	0.06
本市	0.47 ^{***}	0.08
本省	0.60 ^{***}	0.09
外省	0.49 ^{***}	0.08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 未上过学)		
小学	0.01	0.13
初中	-0.00	0.13
高中或中专	0.19	0.14
大专	0.36 ^{**}	0.16
本科及以上	0.62 ^{***}	0.19
初婚年代(参照组: 1979~1989 年)		
1990~1999 年	0.00	0.07
2000~2005 年	0.09	0.07
2006~2010 年	0.23 ^{***}	0.07
省份(参照组: 吉林)		
陕西	-0.03	0.09
河北	-0.39 ^{***}	0.10
安徽	-0.52 ^{***}	0.10
浙江	-0.16	0.12
广东	-0.03	0.10
广西	-0.22 ^{**}	0.09
cut1	-0.77	0.16
cut2	0.10	0.16
cut3	0.76	0.16
cut4	1.22	0.16
cut5	1.59	0.16
样本数量		2220
Wald χ^2		255.88

Prob> χ^2	0.00
Pseudo R^2	0.04
Log pseudo likelihood	-3582.76

注：***、**分别表示 1%、5% 显著性水平。

五、小结与讨论

通过对 2010 年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 本省婚和跨省婚的比例显著增加, 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在扩大; 70% 的农村人口其初婚配偶来自本县, 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主要集中在本县之内; 农村男性和女性地理通婚圈都在扩大, 相比较男性而言, 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扩大的可能性更大。外出务工和高等教育经历是促进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扩大的重要因素, 相对而言, 高等教育经历对农村男性地理通婚圈扩大的作用更明显, 外出务工对农村女性地理通婚圈扩大的作用更明显。

场域、惯习和资本是连接社会变迁和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圈变动的媒介, 它受到社会制度变动的的影响。首先, 宏观社会制度变迁改变了婚恋行为的场域。改革开放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为了更好的就业和更高的收入,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 经济因素对婚姻行为的影响在提升。其次, 人口政策、婚姻法律和户籍制度等社会制度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婚恋观念与行为。农村女性婚姻迁移增加、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加剧, 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性地位相对提升, 婚姻惯习随之改变, 男方及其家庭负担的结婚费用攀升, 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底层男性的婚配困难。再次, 农村人口在择偶与婚恋时更加重视经济因素, 他们不仅选择经济实力或经济潜力更好的配偶或配偶所在家庭, 也选择经济社会更发达的地区。

参考文献

- (1) 谭琳、苏珊 萧特、刘惠:《“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 (2) 刘传江:《择偶范围与农村通婚圈》,《人口与经济》1991 年第 4 期。
- (3) 郭志刚、邓国胜:《婚姻市场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婚姻市场》,《中国人口科学》1995 年第 3 期。
- (4) 陆益龙:《户籍隔离与二元化通婚圈的形成——基于一个城郊镇的分析》,《开放时代》2001 年第 9 期。
- (5) 黄润柏:《村落视野下壮族通婚圈的嬗变——壮族婚姻家庭研究之一》,《广西民族研究》2010 年第 4 期。
- (6) 黄兴球:《仫佬族银姓宗族及其婚姻圈》,《思想战线》2003 年第 3 期。
- (7)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 20 世纪 30-90 年代的冀南农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
- (8) 黄佩芳:《嬗变中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性别比例及家庭结构和婚姻圈——以浙江省萧山后坛村为例》,《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 (9) 周皓、李丁:《我国不同省份通婚圈概况及其历史变化——将人口学引入通婚圈的研究》,《开放时代》2009 年第 7 期。
- (10) 邓国彬、刘薇:《农村女青年远嫁现象》,《青年研究》2001 年第 6 期。
- (11) 贾兆伟:《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欠发达地区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分析——以分水岭村为例》,《青年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12) 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1期。
- (13) 仰和芝:《农村打工女跨地区婚姻模式出现的成因及影响分析》,《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
- (14) 邱泽奇、丁浩:《农村婚嫁流动》,《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 (15) 崔燕珍:《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对当地婚嫁行为的影响——以崔村的个案研究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1期。
- (16) 雷洁琼:《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7) Gupta. M.D., Avraham.E, Sharygin .E. J.:China's Marriage Market and Upcoming Challenges for Eldly Men.,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351.2010

(责任编辑:贾伟)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Geographical Marriage Circle in Rural China and Its Causes

WANG Le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10086)

Abstracts: Using the data from 2010 Survey on Seven Provinces'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rural geographical marriage circle from 1979-2010.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rural geographical marriage circle is expanding. Second, rural males' marriage circle is shorter than females' in general while both rural males' and females' marriage circle are expanding. Third, the experience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high education have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expansion of rural geographical marriage circle. Macro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 change including marriage institution change caus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field, relation and capital for marriage behavior, which in turn lead to the change of rural geographical marriage circle at last.

Key words: rural geographical marriage circle, sex, labor migration, high education